



中医文化研究 第一卷

中医文化溯源

本卷主编 薛公忱

副主编 张昌恩

金鑫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9 号

中医文化研究

主编 任殿雷 赵国欣

第一卷

中医文化溯源

本卷主编 薛公忱 副主编 张昌恩 金鑫

*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路 8 号)

高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5 字数 386.5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

ISBN 7—80560—912—8/G·304

定价 (平)15.00 元 (精)18.00 元

责任编辑 王国钦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医文化研究》编委会

总 编	任殿雷	赵国欣		
副总编	薛公忱	张慰丰	祝世讷	刘兴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兴华	王旭东	王宝瑞	刘兴旺
	任殿雷	张昌恩	张慰丰	李铁君
	金 鑫	贺绚素	祝世讷	赵国欣
	薛公忱			

序

林 德 宏

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医文化的学术专著,共分三卷。第一卷是《中医文化溯源》,论述古典中医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古典中医与古代哲学、宗教、逻辑、科学技术、伦理观念、文艺、教育、民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古代中医学家们的文化素养。第二卷是《中西医文化的撞击》,对中西医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论述两种医学文化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器用特征、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异同;评述中西医文化撞击下的各种学术思潮,分析中医文化面临的危机和出路。第三卷是《中医文化的复兴》,论述在当代科学思潮从机械论转向系统论的时代背景下,中医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指出我们要自觉向人和自然统一观复归,重建完整的人的观念,讨论中医文化复兴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语言科学的关系,中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医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等问题。

像这样一部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医文化的学术专著,在我国还属独创。所以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作者视野开阔,洞察全局,高屋建瓴,从民族的传统和时代的精神出发,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上来分析有关中医文化的各种问题。读者读了这部著作也会产生登高眺望之感,不仅对中医文化有了整体的了解,而且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有新的认识。

在此,我愿就中医文化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若能对读者领会这部著作的内容有所补益,也许就没有辜负主编要我作序的厚意。

(一)

中医学是一种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它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又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我们要了解中医,不仅要了解它的理论,它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技艺,还要了解它的文化气质和品格。我们要发展中医学,也必须弄清我们时代的文化发展趋势。

为此,我们要对中医文化和西医文化进行比较。

本书《导言》指出,中西医不仅有地域不同的空间差异,也有历史时代不同的时间差异。今天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医学乃是传统的中医学,而西医学是在近代实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医学,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我认为古代中医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近代西医文化是一种工业文化。

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不仅创造了物质文化的活动,而且对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种精神文化产品都间接或直接接受劳动方式的影响,打上或浅或深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印记。医学文化也不例外,它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一定时期劳动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的特征。

中西医文化的差异,归根到底,在于它们反映的是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要了解中西医文化的差异,首先要了解农业劳动方式和工业劳动方式的差异。

传统农业劳动是“生物型”生产劳动。农业劳动的原料和产品都是生物,农业生产是按生物生长的规律进行的。农民在生产中不变革原料,只能为农作物的自然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近代工业劳动是“机械型”生产劳动,是按照机械的、物理学的、化学的规律进行的。工人在生产上要变革原料,根据人的设计生产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产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以麦粒为例来说明

辩证否定的实质。对麦粒可以有两种否定,一种是让麦粒种在土里,得到它所需要得到的各种正常条件,它长成麦株,又产生了更多的麦粒。这种对麦粒的否定是按照植物生命的正常进程进行的,是来自麦粒本身的否定。另一种否定是把亿万颗麦粒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这种对麦粒的否定不是按照植物生命的正常进程进行的,是来自麦粒以外的否定。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道出了农业劳动方式和工业劳动方式的区别。把麦粒播在田里让它自己长出更多的麦粒,这就是农业生产;把麦粒磨碎、煮熟、酿制,人为地让它变成面粉、面包和酒,这就是工业生产。

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各有不同的特点,对人们的认识 and 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农业生产的胚种与成体都是有机体,它不能机械分割;胚种的生长是发育的过程;农业生产需要和谐的自然环境;农民是多面手,分工的限制较少。所以农业文化本质上是有机性的文化,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变化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用这种观点来看人,人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他自身处于和谐之中,并同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古代哲学的有机论,是生物型的农业文化的结晶。

工业文化则是“机器文化”。由于机器在工业生产中起着关键作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和空前的效率,所以机器在人的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还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心态。这就形成了以机器为中心,以机器为崇拜对象的特殊文化——机器文化。

机器是人制造的。机器不是由胚种发育而成的,而是人用各种零件组装而成的。机器可以机械分割,机器的各个零件被拆开后仍保持其属性与功能,仍可重新组装成原来的机器。机器是白箱,可以拆开观察。机器是理想的分析对象,要了解一台机器的构造首先要了解它的各个部件。机器的构造具有精确性,每个零件

都有精确的形状和尺寸,占据确定的位置,是理想的解剖对象。机器的结构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静态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它不会演变成另一种形态的机器。机器的故障一般都是由局部零件的故障引起的。机器的基本运动形式是可以重复的机械运动,它的运转规律比较简单。

当人们认为社会的物质财富主要来自于机器以后,就把机器看作是结构完善、功能健全、效率优良的象征。于是在人们眼中,宇宙是机器,人是机器,一切都是机器。社会组织要想取得高效率,就必须像台机器那样运转;每个人都应在社会上做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机器成了宇宙的缩影和标本。机器的可分性、机器结构的稳定性、机器内部结构的直接可观察性、机器零件的可精确测量性、机器运转的简单性和可重复性,直接影响到工业时代认识模式的形成。近代哲学的机械论,是近代工业社会机器文化的结晶。

中医文化是有机体文化的一部分。古代中医学把人看作不能机械分割的有机体,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的健康和疾病,作出生物学的,甚至社会科学、哲学的解释,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人当作一个黑箱来研究;在诊断疾病时注重医生与病人的直接接触;中医的药物是自然药物,大多是生物药材,靠采集或耕种获得;用药注重辨证施治,多味药并服,注重整体调节。

西医文化是机器文化的一部分。近代西医学实质上把人看作是一台可以机械分割的机器;注重用分析、化验的方法把握人的健康和疾病;它尽量用物理学、化学的知识来解释人体的运动,具有浓厚的实证科学的色彩;强调从人体本身的状况出发来治疗疾病;把人看作一个白箱来研究;诊断疾病时注重工具的作用;西医的药物大多是人工制造的、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东西,是靠工业生产获得的;用药时注重有针对性的局部治疗,提倡单药独进。

这就是两种医学文化的主要区别。

(二)

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的医学文化？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各有得失。二者具有不同的风格，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本质。

人是一个矛盾体。人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是一个有机活体，又具有一定的机器的特征。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人又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体的运动是复杂的生命运动，又包含大量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对人的健康与疾病我们可以作出生物学、社会学的解释，也可以作出物理学、化学的解释。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各种器官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人体是黑箱，又是白箱。人体可以当作分析的对象、物理和化学实验的对象，这种分析和实验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可以作定量分析，但这种分析又不能完全反映事情的本质。人体的结构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易性。诊断疾病时既要对病人进行直观，又要借助各种工具。等等。

中医学和西医学各注重生命本质的一个方面。因此，两种医学文化应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医文化和西医文化都需要改革，都需要不断的发展，都需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辩证的理论思维。

(三)

当前，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面临着一些危机，同时又有复兴的趋势。

我们时代的科学思想，正在从近代的机械论转向现代的有机论和系统论。以笛卡儿、牛顿为代表的力学机械论思潮，是一种还原论思潮，即把复杂的运动形态还原为简单的运动形态，把复杂系

统的整体属性归结为它的要素的各种简单属性。这种思潮是机器文化的产物,又对机器的发展和应用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一批科学家已觉察到机械论思潮的局限,他们在寻找新的思想。李约瑟、玻尔、海森堡、惠勒、魏茨泽克、卡普拉、普里高津、托姆、哈肯、哈里森等著名科学家都把目光转向东方,从古代中国的“有机体文化”中汲取营养,来补充西方至今仍广为流行的机器文化的不足。在这种认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医文化必将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重视,人们可以透过丰富的中医文化,进一步看到东方智慧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光彩。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近现代文化可分为阴性文化和阳性文化两种形态。西方文化是阳性文化,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是重阳抑阴,阴阳失调。中国传统文化则含有丰富的阴性文化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阴阳平衡。他说中医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特点。在中医的眼中,每个病人都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整体。现代西方社会要摆脱文化危机,不应像西医那样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而应当像中医那样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在卡普拉的文化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医文化对他的启迪。

李约瑟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①这里说的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医文化。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文化两个基本的、相互补充的方面。它们像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的神态和面貌,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的姿势。他反对把东西方文化割裂开来的观点,更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他大声疾呼:“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

①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①

东方智慧的新浪潮正滚滚而来。中医文化将在这次浪潮中接受新的洗礼,克服自身的弱点,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正是中医文化复兴的契机。

1993 年元旦于南京大学

^① 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40—141 页。

序 二

周 仲 瑛

《中医文化研究》系统地论述了中医学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揭示了中医学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和内在规律,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深深地渗透、融入中医学之中,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自然观、社会观、人体观。尤其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较大。其中的天人合一说、阴阳五行说、元气一元论等,是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建立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依据。此书作者还认为,历史上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的三次高潮,恰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兴盛状况相适应。

此书作者还通过中西医学的横向比较,指出两者是在异质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们不仅在认识方式、器用特征、医家行为规范以至审美意趣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历史发展阶段和认识层次上也有显著的区别。但在两者之间仍然具有内在的联系,应该而且可以相互补充,不能以一方否定另一方。在这一问题上,极端保守和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片面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不应排斥对方,而应相互吸取、渗透,并探索与对方结合的方法和途径。

以上观点应引起重视,并深入进行讨论。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的掀起,是科学技术和医学由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由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本书的问世将有助于从中国文化的高度和广度认识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探讨其兴盛、衰

微、复兴的历史原因,从宏观上把握和阐明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动员中医、西医和其他自然科学工作者,共同为振兴中医药学作出贡献。

特谨为之序。

壬申年十月

导 言

中医药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古代繁荣,近代停滞,而目前则又呈现复兴的趋势。中医药学如此曲折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使其摆脱古老形态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类问题,不仅为中医学界所重视,而且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关注。实际上,认识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医学的兴盛、衰微、复兴的历史原因,从宏观上把握和阐明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只是科学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中医文化概念

何谓文化?中国古代哲人的理解,文化是“人文化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在西欧,“文化”(Cultura)一词产生于拉丁语,作为动词“Colere”的派生词,它的原意是指土地的耕作。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当今人们往往把文化作最广泛的理解,把文化视作就是人化,或者说是人的对象化。人和世界发生关系,把世界对象化,创造了人类文化。其间,针对自然界,把自然物对象化,这就是物质文化。针对社会,把社会关系对象化,这就是制度文化。而针对自身,把自身各种关系对象化,这就创造了精神文化。可见,文化就是人化,人的感情、智慧和观念及其所外化的一切,都可称之为文化。它是一个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普遍范畴。

中医学,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或它的一个方面。但这里所称

的“中医文化”，在“中医”后面缀以“文化”，决不仅仅是为了强调一下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是另有其特定的涵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的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所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印记，是指形成中医学自己特色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就如同所谓“酒文化”、“茶文化”和“建筑文化”等等，不是指制酒做茶以及建筑技术本身，而是指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特征一样。

中医学是以人体疾病为对象的一门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体疾病的规律及其防治的手段、技术和措施，而中医文化研究的对象则是中医学本身，它通过对中医学的形成发展和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医学体系、范式和特色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揭示中医学不同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色及其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和内在规律。所以，中医文化并不是自然科学概念，而是一门具有文化和哲学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医学和中医文化研究或中医文化学，各有其不同的对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因此，那些强调中医特色而把中医学归结为文化，或者强调中医是自然科学而忽视中医文化研究的意义看法，都是片面的。中医作为自然科学，要解决的是认识疾病规律的问题，是防病治病的问题，但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形式，它的规律，则是一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特别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的问题。

二、传统的积淀

中医学的对象是人体的自然规律，但其理论形态有着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不是来之于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文化。中医学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凝结，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是由该民

族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一定经济、政治条件下形成的一定的哲学宗教观点、思维和行为方式、科学技术、伦理、文艺、教育、民俗等等,构成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其中每一个部分又总是同整个系统及其他组成部分相联系的。阿·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说来,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的统治思想。”^① 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不但为自己社会的文化所接受,而且它在建构其理论大厦时,广泛而细致地饱吸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血液”。中医学不但是自然科学,尤其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从中医学理论的渊源来看:“医者意也”,医易相通。《易经》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号谓“群经之首”。它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事变化的规律。其主要价值在于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胡煦评易曰:“浅之则格物究理之资,深之则博文约理之具,精之则天人合一之旨,体则参赞化育之能,是全体大用之要归。”^② 医源于易,因为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乃是通过近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而这正是《易经》所创。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③ 医易同源的含义,不仅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形态的合一。

① 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② 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序》,见《四库全书·易类》。

③ 张景岳《类经附翼》一卷《医易义》。

事实上是,文化上的各个层面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医学之中。譬如:哲学,它是文化传统的灵魂,而哲学思想的自然观、社会观、人体观等,表现为天人合一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元气论,此即是中医理论的纲领;艺术,它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独特形式,其突出特点即是所谓“形象思维”,而这也正是中医学思维的重要特征;民俗,中医学也离不开大量民俗的影响,诸如饮食、婚姻、起居、节日以至服饰等等习俗都是。除了这些以外,还可注意到传统文化在思想方法和心理积淀方面,对医学的特别作用。科学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的需要,更直接依赖于科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和科学家队伍的学识和素质,因此医学家本身的文化素质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历史性的动态发展中追寻中医学演化的历程,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古代的发展曾经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临床医学上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则是我国药物学第一次系统的总结。第二次高潮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时形成了医学分科大发展的兴盛局面,特别是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所谓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的脱颖而出,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中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第三次高潮为明清时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问世,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以及吴又可“戾气学说”的提出,王清任《医林改错》的产生,既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它可能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在原有理论体系内所难以超越的极限。这三次高潮恰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兴盛发展状况相适应。

中国 古代文化氛围产生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范式,使它以整体观念的“天人合一”、辨证施治的“三因治宜”而独具特色。这一